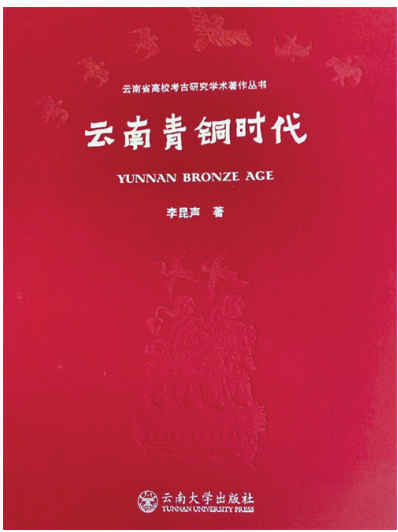


书香彩云南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读《云南青铜时代》

段自滇



云南的农业起源、牛耕起源等问题见解独到，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融汇于此书中。在回答金属冶炼技术、金属制造工艺、金属装饰工艺等问题时吸引了众多学者以及科技考古的成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使我们对云南早期的金属技术有了清晰的认识。云南艺术史是先生多年来关注的问题，在其《云南艺术史》一书中便有集中体现。先生利用考古出土的文物，对云南青铜时代的乐器形态、演奏方法、舞蹈样式、休闲娱乐方式，建筑等皆作了一些还原，虽然这部分不是此书的重点，但通过这些叙述，我们依然能看到青铜时代的云南先民们社会生活的情况。云南青铜时代的物质文化丰富多样，难以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基于此，对青铜时代社会生活的考察，应突出主题，择其典型，宜粗不宜细，本书选取各个地区较为代表性的器物作为解释对象，即使有不少的旧资料，但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提出不少新的见解，难能可贵。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热，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也不断有新的认识。云南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至迟在春秋时期便与各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往来。先生在文化交流方面以其独到的研究专长切入，分析云南与东南亚的文化关系。着重分析了铜鼓、羊角钮钟的传播路线，并对一些来自印度洋、西亚的典型器物，如海贝、琥珀、串珠等进行了介绍。虽然并没有全面系统的论证，只是择一些标本，但通过这些介绍，依然能看出云南青铜时代与外界形成的通江达海的网络格局，足可见与外界交流之深度与广度。

纵观本书的写作风格，舍弃了繁复枯燥的细节论证，而是以大学者写小文章的手法，通过通俗朴素的语言，将云南青铜时代的来龙去脉、社会生活及文化艺术呈现给大众，突出重点，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有兴趣地将此书阅读完。

总之，《云南青铜时代》一书，严谨科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李昆声先生在

熟悉和关注西南考古、云南考古的师友，想必对李昆声先生都不陌生。先生是西南考古的重要学者，尤其在云南考古、铜鼓学领域建树颇丰，其研究几乎涵盖了云南的各个时期，涉及传统考古学、民族考古、艺术史等诸多方面，可谓是云南考古的集大成者之一。他虽年近80，却仍笔耕不辍，就在近日，其新作《云南青铜时代》（云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面世，可喜可贺。畅谈此书，不乏遐想。

该书开篇即将云南的青铜时代划分为起始、发展、鼎盛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公元前17—前8世纪、公元前8—前4世纪、公元前4—前2世纪，并着重分析了如海门口、万家坝、石寨山、李家山等各个时期的代表性遗址和墓葬。关于云南青铜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海门口的年代问题，李昆声先生依据第三次发掘情况，认为海门口第二期（距今3800—3200年）晚段进入青铜时代。后面有学者对这一数据进行了多次讨论，虽然距今3800年的数据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至迟在夏代中晚期进入青铜时代则不误也。海门口遗址不仅对研究云贵高原青铜文明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对东南亚金属冶炼技术的起源也是关键一环。目前海门口遗址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进行联合发掘，其聚落形态等更加丰富的文化面貌逐渐浮出水面，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问题也有望进一步确认，我们期待更多考古新发现来完善我们对云南青铜文明起源的认知。在分期的部分里，书中还着重讨论了铜鼓、铜矛、山字格纹、贮贝器等典型的滇式器物的传播路线、功用等问题，以这些器物作为切入点，使读者对各个时期的青铜文化有更加清晰、具体的把握，非常有“通过一件文物，认识一段历史”的写作风格。

秦汉时期，云南因受汉文化的影响，影响，先生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正值云南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云南的青铜文明并未像其他地区经过发展—鼎盛—衰落的自然规律，而是伴随着汉文

化的兴起，土著文化和青铜文明迅速走向衰亡。也正因如此，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没有将早期铁器时代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导致对云南早期铁器时代的认识含糊不清。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是早期铁器时代从青铜时代中剥离出去，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含有早期铁器时代成分的遗址，如石寨山、李家山、羊甫头、金莲山、大逸圃、八塔台、黑玛井、大甸山等，对其年代、文化面貌及考古学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使人们对云南早期铁器时代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也是本书的贡献之处。

云南的青铜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置之全国可将其视为一个大的地方类型，但因复杂的环境、族群等因素，各个地方的文化呈现出一定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文化谱系的研究则是一项基本工作。以往对云南青铜时代的研究多集中在滇地—抚仙湖流域或洱海地区，造成了滇文化、昆明文化等同于云南青铜文明的假象。云南青铜时代的文化分区，在《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云南考古学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书中也做了较多的工作，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完善，兼顾各个地区的青铜文明，区分滇西北、洱海、滇西、滇西南、滇南、滇东南、滇池、滇中、滇东、滇东北10个地区，并对每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对墓葬、遗址、文化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昆声先生的考古学生涯历来重视文化谱系的研究，不仅是青铜时代，还包括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先生一直告诫我们，云南古史缺乏文献，考古学大有可为，重建云南古史是云南考古的一项基本工作，这一工作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荒废。先生还常常和我们提举师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先生多年来的实践在此书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云南青铜时代的分期和分区占据了本书的主要篇幅，从内容上来看，也是对历年来云南青铜时代文化谱系研究

清丽明快山野气 质朴古雅隐逸风

——陈迺君国画作品管窥

一 笔

清代郑板桥画竹之事。清末“海上画派”的任伯年、吴昌硕使花鸟画再放异彩，尤以吴昌硕影响深远。赵云壑、王一亭、诸乐三、王个簪、陈师曾、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诸人，皆从吴昌硕出。

我在迺君处观画，见到其画的丝瓜线条、轮廓、着色颇似已故大理著名画家谢长辛，便问之。迺君云：其早年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大理分校国画系学习，以谢长辛为师。后又看迺君兄画的“群鸭戏水”似任伯年，他画的“八哥”似李苦禅，便知他追溯至清初及近代，足临摹功夫。观其近几年的画作，则在吴昌硕、齐白石一路苦修，将白石老人那种对比强烈的色彩融入自己质朴的画风中，增加其明快之色。白石老人用粗工细的草虫配大写意花卉，或用重彩与泼墨相结合，使画风顿显热烈，更具人间烟火气，却在“俗”中现“雅”，是齐白石的厉害之处，迺君仿之，亦已做到大俗大雅。白石老人具有生活气息的朴实清新之风，迺君也能仿效，篮中的枇杷、石头上的八哥、芭蕉叶下的小鸡，都显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相对而言，身为海上画派重要画家的吴昌硕，其画风更显高古朴雅，能以俗入雅，其以书法入画，金石气十足，其画墨梅，纯以篆法入笔，显得高古苍劲。其画的紫藤、葡萄，以草书入笔，笔势雄健纵放，紫藤错综交叉，静动、虚实、繁简、刚柔结合，显得纵逸恣肆而又生机勃勃。吴昌硕之画，既有文人之雅，又有平民之俗，他经常画梅、兰、竹、菊、水仙等寻常物事，迺君亦深受吴昌硕影响，擅画紫藤，深得老缶（吴昌硕）之意，擅画竹菊，亦深得隐逸之真趣。

余观迺君绘画，以菊入画甚多，想必他躬身仕途，却有散淡之心。其菊菊

题材有《秋阳》《素韵》《东篱秋色》《丽日》《秋高》《秋阳》《秋晨》等，《秋阳》以两枝菊花横斜构图，上者稀，为黄菊，下者稠，为红菊，菊枝枝叶皆以淡墨入画，菊枝呈“飞白”，浓淡枯湿对比鲜明，尚有朵黄菊将放未放，右上方显眼处两只墨色小鸟振翅飞翔，颇为闲适。左下角竖形末文闲章“长乐”二字。右上方隶书落款“秋阳”，下有行书“辛丑年迺君于大理”，下落正方白文印“陈迺君印”四字。此幅作品黄、红、黑三色相得益彰，色泽浓郁厚重，有朴素古雅之气。《素韵》亦是横构图，菊花，花瓣纯以淡墨勾勒、白描，花枝淡墨飞白、花叶青绿，有几处晕染些明黄，稍显嫩意，菊花背景以极淡墨随意涂抹，似为立石。左下角落钤阴文方印“墨池情趣”，右上角落题隶书“素韵”二字，下接行书“迺君于大理”，单落阳文印“陈”字。此幅画作正如标题，虚实相生、质朴素淡，显得清丽平和，颇得吴昌硕笔意。《东篱秋色》则色彩对比强烈，颇有白石老人画风，几笔赭色，便成篱笆之状，两朵硕大的黄菊挺立绽放，精神抖擞，枝叶从右至左，纯用水墨晕染，墨色从清淡过渡至浓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株红叶红茎的草本植物，占据了画面的半幅，色呈淡红，并非浓艳，左上角有两只身赭黄、尾羽青黑的小鸟低翔。此画落款改为左上横排，右下有条形末文闲章“墨戏”二字。《丽日》则将花鸟与山水结合，背景为淡墨铺就的两座山峰，画面主体为两簇菊花，左为朱红，有九朵，右为黄菊，由右至左横斜，将远山部分遮蔽，有疏朗的十一朵，其枝叶婆婆，均为水墨。右下为正方形阴文“墨池情趣”四字，左上角有两只黄雀振翅高翔。左上角为竖行落款，标题“丽日”为隶书，“辛丑年迺君于大理”，下方阳文印“陈”字。此画

远近、虚实、浓淡、明暗皆具，颇得白石老人神韵。《秋高》较素淡，为青、绿、墨三色，画色统一，浑然一体，不似《丽日》对比强烈。画面正上方两只相爱相惜的八哥，踟蹰于巨石之上，后有疏竹几枝，飘逸灵动，似有微风轻拂。五朵硕大的菊花傲放于画面左下方，两白三黄，叶片晕染为青绿和墨绿，唯有巨石为泼墨涂抹。此画八哥鲜活、菊花饱满，绿竹疏朗，构图虚实相生，雅致清奇。《秋阳》显得极为闲适，秋千架下，几簇菊花，红花奔放、黄花明丽、白花清雅，画面右下方，置一硕大茶壶，三个茶杯随意放置，壶与杯，纯用泼墨为之，这幅画，将画中的人物隐藏在画面之外，想必三三两三人，看花喝茶消暑，闲情偶寄，颇有故事性。《秋晨》亦以菊花为主题，篱畔巨石旁，菊花丛生，红者热烈，黄者贵气，画面左上方，群鸟高飞。至此方明白，所谓花鸟画，有花必有鸟，有鸟必有花，方显动静相宜。

迺君擅画菊，然紫藤和翠竹亦为其所长。在《阳春》中，颇得吴昌硕笔意，以草书法入画。画面正中，用枯墨、焦墨以极快的速度如草书般画出“万岁枯藤”，转折处露出坚实的骨节，中间飞白甚多，使这幅紫藤颇有韧性且有年代感，那种苍茫之感在迺君的画中较少见。与藤干相连接的，却是倒悬的三串紫藤花，朱红、粉红、淡紫相映，显得清丽脱俗，几缕淡绿的叶片，穿插在藤与花之间。三只蜜蜂兼工带写，振翅在画面的左上和右下空白处，右下还有条形闲章阴文印“淡泊”二字。左上落款为隶书“阳春”，行书“庚子年迺君”，下方阳文印“陈”字。此幅画错落有致，枯藤的沧桑感与花穗的清丽相得益彰，正好映衬“淡泊”之意，正是阅尽世事之后的云淡风轻，此画写作甚合余心。《清晓》

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上，以其独特眼光，总览全局，对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的一次系统总结，这个工作是基础性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此书行文通俗朴素，重点突出，适合推广，不仅可以作为考古工作者的案头参考书，也适合广大群众认识云南青铜文明的一个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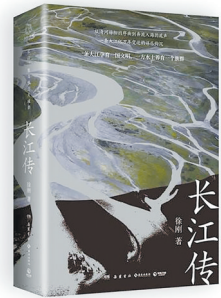
云南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宝库，因其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地缘位置，自新石器时代始便成为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关键节点，人群迁徙流动、经济贸易往来频繁，这种情况在考古学上也得到了印证。进入青铜时代以来，金属冶炼技术从西北传入，发展出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青铜文明。以云南为中心，金属冶炼技术传入东南亚并对其青铜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对云南青铜时代的一些考古学文化的识别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滇、昆明、句町、哀牢等都可以明确其范围，但还有不少的古考古学文化识别存在困难。虽然族属的识别一度成为学界所回避的问题，但云南作为边疆地区，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决定了这一问题无法回避，在材料支撑的情况下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云南有着丰富的人类学资料，这些活态的民族志资料有助于我们解决考古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区系类型的工作是基础性的，建构云南考古的时空框架后，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充分发挥云南人类学的优势，对考古发现的材料进行多方位阐释。尤其是进入青铜时代以来，对聚落形态、文明演进、国家化进程等重大问题进行情境性的还原，这些都是目前云南考古乃至中国考古的薄弱之处，但云南凭借丰富的人类学资源，今后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以李昆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为云南考古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作为先生的晚辈学生，我常常能感受到先生对我们寄予的殷切希望，也期望更多的青年学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全面、深入、多层次、宽视野地研究云南及西南历史与文明，为往圣继绝学，为重构云南古史、西南古史赓续发力。

新书快递

一曲雄江向东流——读《长江传》

刘小兵



奔腾不息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但凡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一提起长江，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腾起自豪的情感。徐刚的《长江传》（岳麓书社2023年1月出版）以纵横捭阖的文笔，叙述着这条大江的前世今生，努力探寻着蕴涵其间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勾勒出一幅恢宏之江、文明之江的灿烂图景。

作者结合相关史料，追溯了长江漫长的生成史和演进史。距今7亿多年前，长江的大部分区域还处于一片汪洋沼泽之中。直到距今300万年前，才在一片混沌之中横空出世，从此开启了它的壮阔之旅。由于长江九曲连环纵横交错，有关它的源头之说也几经更易。从最初的楚玛尔河，到最终的沱沱河，一路裹挟着文明的基因，涤荡着历史的尘埃，于激昂的交响中，长江的傲然雄姿才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沿江藏族、蒙古族牧民心中，长江是“红色的河”“宽阔的河”，既养育了他们，又赋予了他们坚强的品格；使他们与沿岸而生的其他子民们一道，世世代代倾情守护着这条江，赓续和传承着古老而悠久的长江文明；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倾力开发和利用好这条江。至于普天下的华人，更爱用“东方巨龙”来称谓长江江。他们不但以诗词歌赋的咏诵方式，热切赞誉着长江的雄阔历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维度，深入探究着长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究竟发挥着怎样的积极作用；并用心思考着人与长江这一命运共同体话题。不夸张地说，长江的美好印迹，已经深深印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它凛然不屈的气质，越挫越勇的品格，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清晰地烙印在炎黄子孙的灵魂深处。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天地轮回，岁月更替，人们始终用优美的歌声来赞颂它恢宏的历史，“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日暮晨昏，时光如流，人们同样用华丽的辞章来点赞长江的浩渺无边。书中，作者以一个文化行旅者的身份，乘着一叶扁舟，循着历史的长河，一路顺江而下，采撷着长江两岸旖旎的自然风光和动人的人文盛景。他不仅写到了长江的源头之争，描述了支流河系金沙江、岷江、洞庭湖、鄱阳湖的摇曳多姿，还以生动的笔触，描摹了乐山大佛、赤壁、庐山飞瀑、金陵王气等文化景观。发人深省的是，作者没有一味地沉湎于历史的荣光中，而是在探幽历史的过程中，格外清醒地审视着长江水系的现状，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长江绿色生态环境的保护，为长江水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随着绿色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以及国家保护长江水资源相关政策的实施，以往人们在开发与利用长江水资源上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思想，以及涸泽而渔的短视行为，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扭转及遏制。特别是长江沿岸地带的人们，不仅把这条江视为他们心目中的最耀眼生辉的珍宝，还爱屋及乌地把周围的山川河流，虔诚地称为“圣山”“圣水”，在不遗余力地保护长江的同时，同样以百倍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整个长江水系的综合治理中。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今，长江沿线一带的芜塘高原、玉树草原、可可西里等地，已从昔日的苍茫之地，蜕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广阔绿洲。静寂的时光里，每天，山、湖、水、草深情地共拥着一脉奔涌的长江，雪豹、藏羚羊、野牦牛等珍稀物种，悠然生活在这片爱的阳光与雨露里，撒着欢在这里追逐奔跑，在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的过程中，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传奇。与此同时，随着“十年禁渔”政策的落地实施，长江的渔业发展，特别是白鲢豚等珍稀物种，在人类的精心呵护下，必将得到有效的保护，一个万物霜天竞自由的生长环境，正在神州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鲜活呈现。

新书快递

《麝过春山草自香》出版



张晓风散文集《麝过春山草自香》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3年4月版）。书中收入作者52篇新作，作品由日常生活生发，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自成一格，广博的视野中见坚实的学养，睿智的思考中饱含深切的情感，日常事、平凡人，一草一木，皆自成风光。

张晓风，1941年生，江苏铜山人，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著名散文家，著有《白手帕》《红手帕》《春之怀古》《地毯的那一端》《愁乡石》等，有多篇作品入选海峡两岸中学教科书。

郑千山